

国家图书馆◎编

图·文·全·本

部级领导干部 历史文化讲座

文化卷

下册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目 录

下 册

陈 来	中日韩三国儒学的历史文化特色	(415)
卓新平	宗教对社会的作用	(451)
楼宇烈	佛教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499)
湛 如	佛教要旨辨析	(531)
王 尧	西藏与藏传佛教	(571)
金宜久	伊斯兰文明与当代伊斯兰问题	(591)
李伯谦	夏文化探索与中华文明研究	(625)
孙 华	古蜀文明的新认识 ——以三星堆、金沙村遗址和商业街大墓为中心	(665)
文怀沙	中国风骚传统与现代商品社会	(683)

李致忠	珍品琳琅论古今	
	——中国古籍的起源与形制演变	(695)
冯骥才	“文化遗产日”的意义	(723)
田 青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盛宴	
	——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专场晚会”上的即兴解说 ...	(755)
郑欣淼	关于故宫与故宫博物院	(773)
何振梁	奥林匹克运动及其人文精神	(793)

陈 来

中日韩三国儒学的 历史文化特色





陈 来

陈来，1952年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温州。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1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198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2年被国家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8年被教育部评为“跨世纪人才”。

现任北京大学儒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并在清华大学、武汉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校兼任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中国哲学学会（ISCP）副执行长。

学术领域为中国哲学史，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宋元明清理学。曾获得中国图书奖二等奖（1992）、国家图书奖提名奖（2002）、宝钢全国优秀教师奖（2003）、北京高等教育教学一等奖（2004）等多种奖项。

引 言

中日韩三国对“儒学”这个词的用法不太一样，日本比较喜欢用“儒教”，中国很多场合用“儒家”，所以儒家、儒学、儒教可以说是跟主题相关的三个关键词，可以互换，但是也有区别。

这三个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都出现过，在今天的用法里三者的区别是什么呢？一般讲，“儒家”主要是强调作为一个学派的特性，儒家学派跟道家学派、跟墨家学派相区别，作为



山东曲阜孔子像

一个学派是从孔子开创，到孟子以后，由历代儒家学者所构成。所以用“儒家”的时候比较强调、注重其学派的特性。“儒学”往往强调儒家学派里学术体系的方面，因为儒家包括很多内容，比如政治、教化的实践，当讲“儒学”的时候，比较侧重在历史上儒家所建立的学术性体系。

“儒教”的用法主要是在历史上往往注重其作为一个教化体系的意义，因

为一个社会不能没有教化。我想社会不仅是从文明时代初期开始，一直到今天虽然所谓自由民主等等很多新的观念都出现，但教化始终是重要的。任何时代，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对社会和文化的教化工作要有承担，这个责任的承担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历史上，对社会和人民进行教化工作，教化在今天包括思想道德教育这类意义上的教化，也包括一些文化教育。古代思想文化道德教化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各级各类的儒家的学者和组织来实现，当谈到教化体系的时候，就用“儒教”的概念。中国古代大体是这样的。

日本人用“儒教”，其实也兼指中国在“儒学”和“儒家”使用上的意义。韩国也是一样，韩国也是多用“儒教”的说法。

当然“儒教”这个词自20世纪以来，在东亚所谓宗教的重新建构里也有一些新的意义。比如“儒教”在中国历史上主要是讲一个教化的体系。不一定叫作“教”就一定信神，信不信神没有关系，关键是有一套教化的体系。教化体系里有理想的人格，比如圣人；有经典，比如《论语》。有一套教化的体系就是一个教。但是近代以来，因为受西方宗教的影响，所以“儒教”也有一些新意义。比方在香港有儒教或孔教作为一个真正的宗教组织向政府申请注册。再比如韩国的儒教已经带有宗教性，政府也承认它是一个宗教组织。宗教组织在社会上扮演一些政府或者其他领域不能够扮演的角色。比如韩国的儒教组织每年要发“孝道奖”，表彰对父母尽孝的人士，“孝道奖”不是政府发的，是宗教组织发的。韩国前总统金泳三就接受过“成均馆”儒教领导人颁发的“孝道奖”。这都是题外话，就是说儒教的概念到近代以后也有一些新的变化。

除了儒家、儒学、儒教以外，20世纪以来，还有新儒家、新儒学、新儒教

的概念，常常用来指宋代以后中国的儒家思想，也就是理学。

为什么叫作新儒教？因为在明末清初，也就是17世纪左右的时候，有一些耶稣会士的外国传教士来中国，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利玛窦。他来了以后开始研究中国思想，因为传教士也要本土化，跟本地的文化资源相结合。

先秦已经有孔子、孟子、荀子，当然还有曾子、子思等等，构成古典儒学，或原始儒学。古典儒学大体上是在公元前200年以前提出的儒家学说。中国古代所谓儒家经典主要也跟早期的儒学思想有关系。比如今天讲的《论语》、《孟子》，所以中国人习惯把儒家的理论叫作“孔孟之道”。

但是传教士来了以后，发现影响当时中国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不仅仅是古代的孔孟之道，而且还有宋代以来学者对孔孟之道的新的解释。比如从南宋以后，特别从元代开始，科举所有考试的标准答案用的都是朱熹写的对孔孟的解释。即南宋理学家朱熹对四书所作的注解。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都是先秦古代儒家的经典著作。朱熹做了注解以后，从南宋后期开始，元明清三代科举考试用的都是以此做标准的教科书，所以知识分子、老百姓都受它的影响。

朱熹也有教化的实践。比如朱熹写了《朱子家礼》，在社会层面提出了规范。比如在家里应该怎么做？怎么做儿子？怎么做媳妇？怎么做弟弟？怎么做哥哥？家庭邻里关系怎么处理？当然包



朱 熹

括结婚时用什么礼仪，丧事用什么礼仪。《朱子家礼》在社会层面，特别是明清时代对中国文化影响相当大，韩国也受其影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仍然主要用《朱子家礼》。韩国的社会比中国更加传统，所谓传统主要在儒家思想文化方面，而儒家思想文化如果在社会层面看，就是如何按照《朱子家礼》做事。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出宋代以后的儒家学者对文化发展塑造的积极意义。

所以传教士研究以后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有两截，一截是先秦时期的，公元前200年以前的，一截是公元10世纪以后。他说这很像西方，西方古代希腊时代有柏拉图主义，后来有新柏拉图主义，于是传教士把宋代以后的中国一般称为宋明理学的儒学形态起个新名字叫“新儒学”。日本有时称为“新儒教”。

先把这些基本概念作一些简要说明，因为这些关键词，大家在报纸上在文章中也可能会看到，也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疑惑，这几个概念大体是可以互换的，但是儒家侧重学派的属性，儒学侧重学术的体系，儒教侧重教化方面的特点。

今天谈谈东亚各国儒学的历史文化特色，是因为儒学如果从一个更大的视野来看，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文化，从世界的角度看，至少是东亚（中日韩以及越南）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传统。当然，中日韩的历史文化传统不仅仅是儒家或者儒学，如果从整个东亚共同性的范围看，佛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传统，还有一些本地的传统。但是能够作为一个共通的东亚传统，学术界、文化界对儒学对东亚社会的塑造作用以及对东亚价值观的形成更为重视。因此儒学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更是一个东亚共同的文化。

日本京都大学已故的历史学家岛田虔次，曾称宋明理学是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在这个意义上，儒学包括两代，第一期先秦儒学，第二期新儒学，两代都是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当然它发源于中国，但同时也传播到东亚，成为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也成为东亚文化的共同传统。

但是日本、韩国除了中华文化传播过去以外，本地有自己的一些历史文化因素，包括宗教、一些民俗文化的传统，所以一个外来的思想文化在本地生根发芽，一定会受到本地思想文化因素的影响。于是，经过长期的磨合以后，在日本、韩国社会里得到发展、得到强调的那个形态的儒学可能就跟其他地区的有所不同。

中日韩三国都有儒学传统，如果讲孔子，大家都尊敬，但是这三个社会形成不同特色的传统，这种传统对民族精神和近代化有有一些什么影响？这是今天想探讨的一个课题。

儒家思想发源于中国，这是中国人的常识。但有些韩国人认为儒学发源于韩国。因为中国古书记载，周武王伐殷以后，殷代末年的大贵族箕子东渡到朝鲜，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箕子一篇重要的文献《洪范》，现在收在《尚书》里，而《尚书》是儒家经典五经之一。所以韩国人有时说，儒家的发源地在韩国，不是在山东（山东曲阜是孔子的老家）。箕子虽然提出一些思想，但不是完整的儒家思想，特别是今天所看到的儒家思想的一些主要特征在箕子的书里没有提出来。另外箕子东去的故事还需要历史学家真正做一些研究才能



韩国的传统服饰

说明。所以我们说儒家思想发源于中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儒家思想又广泛传播到东亚汉字文化圈。因为以汉字为基础、以汉文的典籍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文化很早就传播到东亚邻邦，在漫长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各民族本地的传统不同，精神气质不一样，地理、历史、社会存在条件的不一样，造成文化的差异。比如秦汉时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其历史和社会发展以及文明的程度还赶不上中国。从地理来讲，日本是一个岛国，韩国是半岛国家，跟中国地理条件不一样。由于这些条件不一样，在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日本、韩国的儒学形成各自的个性和特色。

一般来讲，很多学者认为，在理论形态上看，韩国儒学可能发展和关注的是一些比较抽象性的讨论，主要是16、17世纪（相当于中国明朝中后期），韩国儒学特别讨论一些儒家比较抽象的概念。像“四端”和“七情”，“四端”是人的道德感情——仁义礼智，“七情”是喜怒哀乐爱恶欲。四、七的问题韩国的学者在历史上有很多讨论。所以很多人认为韩国的儒学可能是比较注重内在性的、心理方面的，或者比较抽象的东西。

日本儒学比较发展外在性的东西。比如日本江户早期的儒者贝原益轩，就比较注重对外在事物的研究，诸如花草树木等等自然界外在的东西的研究。另外19世纪中期获生徂徕比较注重政治学的研究。所以一般认为韩国学者比较注重内在、抽象的东西，日本的学者比较注重外在，或者是自然，或者是政治社会。

但是这里想讨论的问题是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中日韩社会跟西方还没有做全方位的接触以前，三国的儒学特别是他们的精神气质（ethos）是什么？精神

气质的概念是一个文化人类学的概念，现在叫文化精神，三国儒学里体现的文化精神是什么？不要只讲理论特色，还要讲文化精神，文化精神跟民族、社会的关系更直接一些。精神气质换一个角度叫价值类型，就是一个文化里把什么价值看得最重要？比如一个社会把自由看得最重要，这是一种价值特色，可能另外一个价值体系里把平等看得最重要。这两个价值体系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也关心在中日韩儒学结合本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发展以后，它的精神气质各自有什么特点，各自的价值类型有些什么表现。

近年来有关亚洲的比较文化，特别是有关东亚儒学的比较研究，有一些日本学者走在前面。其中有一位是前东京大学的教授沟口雄三，是一个左派学者，20世纪50年代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然90年代以后他有一些改变，但是他的研究还是值得重视的。因为他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又是日本人，所以他对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思想都比较熟悉，他在比较儒学的研究方面提出一些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见解，可以参考，给我们一些启发。^①

简而言之，今天的讨论是在儒家所提倡的关于“德”的思想方面，“德”就是现在讲“以德治国”的德，“德”当然是道德、德性，“德”也可以是某一个方面的道德、德性。比如仁义礼智，仁是一个道德的德性，我们常说这个人很“仁义”，这句话的“仁义”就是作为个人的一个德性。另外仁义又是一种价值，价值就是它规定了、体现了我们的理想。比如仁在中国近代表现为“大同”理想，这就不是一个个人的德性。

所以，如果就儒家所讲的“德”的德性和价值来看，把中日韩三国加以比较，其中就有差别。大体上，中国儒学突出“仁”，韩国儒学突出“义”，日本

儒学突出“忠”。如果用两个字讲，可以说中国比较重视“仁恕”，孔子对“恕”有明确的解释，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这儿多说几句。有关宗教和传统的价值在当今社会的意义，从1989年以后在国际上有一个动向叫作世界伦理运动。就是欧洲和美国的一些神学家和宗教学家有鉴于在欧洲当然也包括中东这些地区冲突的出现，提出了一个概念，“没有宗教的和平就没有世界的和平”。它认为所有的冲突都跟宗教有关系，不仅仅跟政治利益，也跟宗教一些背景特别有关系。比如伊斯兰世界跟以色列的冲突有宗教的关系，像科索沃在巴尔干半岛也有宗教的因素，像穆斯林和天主教、东正教的关系。因此他们就提出“没有宗教的和平就没有世界的和平”的观点。要实现世界的和平，除了要去做政治的、外交的斡旋以外，从根本上要把文化宗教的问题加以解决。因此90年代初在美国召开了一个世界宗教会议，世界上各种大小宗教代表聚集一堂，探讨在每一个宗教教义里找到一些共识问题。这些共识主要不是信仰方面，不是神（因为有的信安拉，有的信基督），而主要是伦理方面。最后大家找出来若干条，可以归结为一个最根本的原则，总结为世界宗教的金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

在世界各宗教里面找这句话的出处，就发现和这句话意思相近的，最早大概是在公元前七八世纪的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里，其次就是孔子，而孔子讲的最明白最清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变成世界宗教都承认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我们可以说中国凸显“恕”，如果用两个字，我们中国是“仁恕”。韩国凸

显“义节”。旧戏比如京剧传统戏目里面，很多都是讲节义，就是要守住一个节操，当然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人生的。日本凸显“忠勇”。这种不同反映了各自价值体系的差异，也可以说反映了三个国家文化原理的不同，就是文化里可能有很多原理，但是有一个支配性原理。

一

首先我们来看中国。中国古代的文化，“仁爱”观念居于核心的地位，特别是儒家思想可上溯到西周初期，就是公元前1000年人道主义的保民思想。在《尚书》里有很多保民的思想，比如对人民要像对待赤子一样保护，“若保赤子”，这种观念在《尚书》里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思想，也是一种伦理价值的体现。

《尚书》里很多篇都提出，不要欺负老实人，不要欺负孤儿，要照顾那些寡妇等，就是对于弱势群体不能欺负，要照顾。这种对于像孤寡老人、失去父母的幼孤的特殊关照以及把这种思想放大为统治者对人民应该抱的一种态度，是中国早期人道主义的开始，事实上中国人讲的孝的观念，对父母的一种感情，应该和这个早期人道主义思想也有关系。

孝和仁爱有关系，因为孝是仁爱感情的一种，仁爱是比较普遍的一种，孝是对父母一种特别仁爱、关爱的感情。所以孔子讲“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孝悌是仁的根本，孝悌跟仁联在一起。孔子的意思是，要想做一个仁爱的人，首先要对父母好，连父母都不能孝敬，怎么能设想可以爱其他的老百

姓，怎么能做一个爱民如子的官员？所以孝悌是“仁”的根本。

“仁”的意义在孔子以前就提出来了，但是孔子给予了最高的重视，孔子把“仁”解释为爱人，“仁者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要发展，但是也要想到让别人立起来发达，这叫“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是说自己发达就完了，要考虑到别人。还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都是孔子“仁”的基本观念。所以“仁”在孔子思想中是一个普遍主义的伦理原则，不仅仅对自己的父母要仁，对自己的家族或者家庭要仁，“仁”是一个普遍的伦理原则。

先秦时期，人们就总结孔子思想，说“孔子贵仁”，指儒家把“仁”看得最尊贵、最宝贵。“孔子贵仁，墨子贵兼”，墨子的“兼”不是兼并的意思，而是兼爱，是普遍的爱，不能只爱自己的父母，还要爱别人。

所以在中国古代最早的思想发展中，孔子以“仁”作为最高的原则，墨子以兼爱为最高的理想原则。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慈”即爱。孔子、墨子、老子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哲学家，孔子贵仁，墨子贵兼，老子守慈，中国古代三位最早的也可以说最重要的思想家其实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对仁爱的原理做了肯定。

战国时期孟子出现，“孔孟之道”的提法，说明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孟子就大讲“仁民爱物”。中国古代有一个名家，讨论概念的，名家里有一个叫惠施也叫惠子，提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要把天地万物看成是一家。这些都跟前面讲的兼爱、仁爱思想相通。

唐以后儒学思想仍然强调这一点，唐代大学者也是唐代儒家的代表人物韩

愈，在其所写的文章《原道》中解释“仁”为“博爱之谓仁”，“仁”就是一种博爱的思想。

宋代哲学家张载第一个在历史上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他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就是说老百姓都是同胞，“物与”，“与”是朋友的意思，老百姓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朋友，从这里引申出对老百姓、对万物的一种态度。

同时，宋明理学新儒家里跟张载同时的一位有代表性的理学家程颢讲，“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要把天地万物看作和自己息息相关，要去关心、爱护它们。他当时举了一个例子，说中医里讲手足麻痹的症状叫作“手足不仁”，他说这个概念非常好，“不仁”就是不通，掐也不疼，感觉不到是自己的一部分，所以“仁”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要把它感觉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要把它其他的事物和人看成和自己息息相关。

这些思想都把“仁”放在一个最高的地位，把“仁”作为中国文化、儒学文化里一个支配性的原理，也就是文化里要讲仁义礼智信，但“仁”是支配性的原理。

在中国儒学里，“仁”的解释跟“爱”、“和”、“恕”、“公”的价值有密切的关系。“仁”是要引申出一种爱，一种人道主义的理念。“和”就是人际关系的和谐，“仁”跟和谐有关系。所以“爱”和“和”都可以说是从“仁”里面出来的。还有“恕”，“恕”在最通俗的意义上是能够宽容别人，能够宽容别的文化，能够替别人着想，站在别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另外是“公”，当然是跟“私”对立。历史上的儒学对“仁”的讨论跟“爱”、“和”、